

走近大思想家



(德) 洛伦茨·耶格尔 著
lorenz Jäger
陈晓春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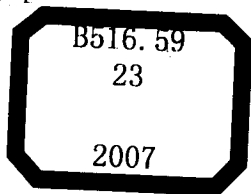


ADORNÒ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

ADORN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

走 近 大 思 想 家

(德) 洛伦茨·耶格尔 著
lorenz Jäger
陈晓春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德)耶格尔著;陈晓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走近大思想家)
ISBN 978-7-208-06765-3

I. 阿... II. ①耶...②陈... III. 阿多诺,T.W.
(1903~1969)—传记 IV.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03955号

责任编辑 湛 嘉

封面装帧 陈 楠

走近大思想家

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

(德)洛伦茨·耶格尔 著

陈晓春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插页 4 字数 224,000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208-06765-3/K·1293

定价 22.00元

目 录

序言	特迪 1
第一章 期待时的迫切心情.....	5
第二章 寻找学说	19
第三章 哲学和音乐	40
第四章 坚决要求公正:社会学研究所.....	60
第五章 俗气艺术、死亡和危机.....	79
第六章 在变化的形势中阅读	88
第七章 在朦胧之中.....	104
第八章 开始流亡.....	118
第九章 美丽的新世界.....	139
第十章 《启蒙的辩证法》.....	162
第十一章 舍恩贝格、福斯特斯和斯特拉文斯基	174
第十二章 权威性的性格,圈子的病态化	187
第十三章 “或许我们该返回德国”.....	197
第十四章 法兰克福学派.....	218
第十五章 反抗是种信息.....	237
第十六章 与大学生的冲突.....	259
后记:被遗弃的房间	281
致谢.....	288
缩略语.....	289
人名对照表.....	292

序 言

特 迪

在简短地刻画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性格时，阿多诺说起了他儿时对这位作曲家创作的一个作品的怀念。它为一种浓郁的时代气息所包围，那是种让这位小男孩无法理解的神秘气息，他只能隐隐约约地察觉到它的存在。但大人们要给他解释清楚也非一桩易事。在看歌剧《莎乐美》时，人们告诉他，这是关于一个牛头的故事。看威尔地的《奥赛罗》时，他被告知这是有关一块手帕的故事。在得不到解释的时候必须开动脑筋去想象。阿多诺这样写道：“我的想象力远远超出了 Elektra 这个词的涵义。这个词，发出怒号、传播着由人编造的恶毒可又让人渴望知道的传闻，全然像本城的一家大型化工厂，它有着极为相似的名字（德文中的电流为 Elektrizität——译者）；像电流般冰冷而又白晃晃地刺眼，它似乎就叫电；是一种用电推动的互相牵制的系统，它泄出氯气，只有成年人才可以进去，它发出亮闪闪的光，机械性的，对健康有害。”^① 这是指当时人们通常见到的一种情况，那时现代工业正在法兰克福兴起，同时也指阿多诺家中的情景。阿多诺音乐方面的启蒙教育由其母亲担纲，她是位歌唱家。伯父伯恩哈德·维森格伦德，是位自然科学家，在 1894 年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叫《电，它的生产，实际应用和测量》，这是本科普及读物，适合于每位读者。对这个男孩来说，“Elektra”这个词表示

2 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

着现代，它既近在咫尺但又是那么遥不可及，这是个不加区分，将艺术、社会和生产力汇集在一起的一个标题。

1903年，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艾丽卡》(Elektra)在柏林首演。那是阿多诺来到人间的一年。1903年，古斯塔夫·马勒创作了他的第六交响曲，他结识了阿多诺·舍恩贝格，后者在这一年完成了《古雷之歌》(Gurrelieder)和《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Pelleas und Melisande)——尤其是后一部作品，是处处动摇音乐界限的一个乐曲，它引领了无调性音乐的开始。弗兰克·韦德金德的戏剧《地神》以及他的散文集《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问世，接着，1904年出版了《露露》的续篇《潘多拉的盒子》。年方二十的安东·冯·韦贝恩写下了他的第一批没有编上号的歌曲；此时阿尔班·贝格开始作曲；正是这位贝格，他悉心照料自己的学生阿多诺，后来为《露露》改编成的歌剧谱了曲。不仅仅是乐曲，而且听众对音乐的接受都开始发生变化。1903年，人们第一次将威尔地的全部歌剧录制到40张虫胶唱片上。1903年是现代派遭到印象派排斥的一年，不只是在音乐中，同时也是开始形成自己的、严格的规则的一年。从当时正在画《熨衣女工》和《古雷之歌》的毕加索那儿，阿多诺后来说，这促使他站到了与造型艺术关系的中心：“我还无法区分魔术和震惊，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些画，那恣意挥洒和构思严谨的画面结构给我带来的震撼，以致无法继续翻阅这本必须一看的、似乎承受着历史灾难的重压、无奈地遵从着绘画内部发展规律约束的画集。”^②艺术训练的另一头，被阿多诺后来称之为文化产业的东西正在萌芽：广告艺术成为德国工艺美术学校的课程。1903年，也是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对时代作诊断的学科而显露头角的一年。这一年，格奥尔格·西梅尔写了一篇题为《大城市和精神生活》的杂文；埃米尔·涂尔干在大学作关于社

会和道德的讲座；马克斯·韦伯在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问题，尤其是探讨社会学是否可以进行“无价值的”研究的问题。在德国，这一年，德国汽车俱乐部(ADAC)的前身问世。在美国，福特公司成立了，它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合理化和组织化的整个时期留下了它的大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的党代会上批判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因为他要用和平演变和改革式的制度变化来替代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解释说，要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的原则。罗莎·卢森堡在190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20周年时，用马克思的最有名的一句哲理性句子作为她文章的开头，这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903年的诺贝尔奖颁发给了比埃尔·居里，表彰他对放射性现象进行的研究：大自然本身有着巨大的引力。莱特兄弟成功地作了首次飞行；灵活性和危险性以同样的速度在增长。托马斯·曼发表了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将艺术家与市民对立起来。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分裂为由列宁领导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和有着改良倾向的孟什维克。还有：特迪熊(Teddybär)在莱比锡博览会上由玛加蕾特·施泰夫作了展示——它的名字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起的，他在一次外出打猎时让一只熊从枪口下死里逃生。“特迪”(Teddie)这个名字也将成为阿多诺在家中和他的友人称呼他的绰号和昵称。

阿多诺的后期哲学著作《否定的辩证法》的开头，听起来像是后来对罗莎·卢森堡援引马克思的话所作的回应：“或许这一解释还不足以预言实际上的过渡阶段”^③。如果不是试图将其与1903年作为哲学家的那一情况相联系，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中展现它，将它说成是规范的，并在最后断定这种情况所拥有过的时代早已消逝，那么阿多诺的作品会是怎样的呢？但这是否可以证实，在他出生的时代背景下，是否会有另外人涌现出来？



“哲学本是用来兑现动物眼中所看到的东西的”，1956年3月24日，阿多诺对马克斯·霍克海默说。

注释

- ① GS 16, 282。
- ② GS 20/2, 524。
- ③ GS 6, 15。

第一章 期待时的迫切心情

奥斯卡·维森格伦德(1870—1946)是位富商,做着葡萄酒买卖。他是犹太人,但皈依了新教,也让自己的儿子改信抗罗宗,不过,这完全是遵照他那信天主教的太太的意思。阿多诺的母亲玛丽亚,娘家姓卡尔维利-阿多诺(1864—1952),是位移民的女儿,父亲是科西嘉的一位击剑冠军。母亲的妹妹,钢琴家阿嘉特·卡尔维利-阿多诺(1868—1935)也住在这个家里。阿多诺喜欢谈他的家谱,他的家族可追溯到阿多诺·德拉·皮亚那,那时属于格努泽·多根家族,因这个家族与科隆纳王室有血缘关系(就如经由海格立斯与朱庇特攀上亲戚关系一样)。——反正他的朋友和学生彼得·冯·哈泽尔贝格是这样说的。^①在这儿先得说一下有关这个家庭的传说,不过这也是世间的一则逸闻而已;这户人家人才辈出,只是夫妻双方的年龄差异倒并不那么典型。对一个投身于美学理论的男人来说,意大利血缘不管其真实程度如何,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伊曼纽尔·康德称,“意大利人”有着与生俱来的“一流艺术欣赏力”;^②维克托·黑恩说,意大利是“嘹亮歌喉的故乡,那是一种高贵生理结构的象征”。^③在意大利,从古希腊、罗马经文艺复兴到近代,都有着有关艺术的历史记载,这成为欧洲的典范。正是在意大利的悦耳歌声和德国的理性主义的结合中,阿多诺后来看到了维也纳音乐传统中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两者相互契合的条件,他似乎从

中看到了从莫扎特到他的老师阿尔班·贝格的广泛的相互联系。奥斯卡·维森格伦德年幼时在英国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如哈泽尔·贝格所说的那样，他“长得瘦小，但却很结实，人们完全可以想象，他终生都是个醉心于英国的人。但要补充的是，这种偏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兰克福是司空见惯的，对普鲁士保持一点矜持也是一种时尚。”^④在皈依基督教后，犹太教更多的只是成为了一种记忆。但这是对一种严格的、反对神化的上帝概念的历史记忆；是对被选定、遭迫害、流亡的记忆，是对弥赛亚的期望、先知的正义热情，对归于犹太民族的伦理地位这段历史的记忆；是对作为外来人有可能在埃及和巴比伦的宫廷中充当解梦人和征兆解释者这种地位的记忆；是对阅读和学习文字的记忆，是对找寻历史上上帝留下的足迹的记忆。从将痛苦和希望用世界历史中未曾有过的方式加以戏剧化的这种对历史的理解中，渗入了一种悲伤、渴望的特性。还有陌生的东西——尽管像阿多诺父母这种情况是由母亲传递来自南方的知识，而父亲传递的是有关犹太人的情况——对一个孩子来说，始终是强制他去强烈地感受这一点。来自父母的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文化内涵不是那么简单、天真地随便接受的，而是要求在内心时时作出默想。一个相似的例子是早就显现出天赋的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他的家庭同样是由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组合而成的。

此外，该家庭还具有一种热衷于交际的、世界主义的特征。阿多诺在流亡美国期间写下的散文和格言集《最低限度的道德》中的《香水草》，沉醉在与世界坦率面对的令人喜悦的经验之中。该散文讲述的是家庭的一位女性友人来访，客人名叫伊丽泽·冯·赫茨贝格尔，时年15岁的阿多诺向她献上了他根据特奥多尔·施托姆的诗歌而创作的最早的两首歌曲：“有客人来家里过

夜，他那充满着期待的那颗心比起圣诞节前夕跳动得更快。那期待并非要得到礼物，而是生活将发生变化。他被允许看那来访女士打开行李，看她把香水置放在走廊里。香水散发出与记忆一般的香味，他第一次闻到时就有这种感觉；上面写有Suvrettahaus和Madonna di Campiglio 标牌的箱子装有阿拉丁神灯和阿里巴巴宝石，它们都被华丽的织物包裹着；来访客人穿的衣服是从瑞士和南蒂罗尔的商旅货栈中连夜用小轿子运送过来的，为的是让人们开开眼界。”^⑤世界之广袤，即便只是邻国，也在孩子面前展现着自己。

音乐构成家庭的文化中心。属于阿多诺学生辈的电影导演亚历山大·克卢格，有一次曾讲起，阿多诺的母亲——哲学家总是称她为“从前的皇家宫廷歌剧女歌唱家”^⑥——是怎样扮演《齐格弗里德》中的林中小鸟这一角色在欧洲巡回演出的。对阿多诺肯定拥有的在音乐文学方面的丰富知识，流传着令人钦佩不已、但有时也令人难以置信的轶闻趣事。托马斯·曼在与阿多诺共同创作《浮士德博士》这部音乐小说时说道：“他通晓典故，对音乐的全部情况了如指掌。一位与他共事的美国女歌唱家告诉我：‘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他熟知世上的任何一个乐谱。’”^⑦这种能力很早就形成了，而且是不费气力、信手拈来；阿多诺写道：“那些我们通常称作古典的音乐，在我孩提时代通过两只手的弹奏已经熟知。这很少是从交响乐和室内乐的作品中获得的知识，如果没有由装订工制成大部头绿色书籍的帮助，它们也是不易进入寻常人家的。它们做的似乎很适合让人翻阅，早在我能认识音符以前，我就获准翻看这些书，不过只是凭着记忆和辨音力罢了。”^⑧然而，阿多诺起初时学的是小提琴和中提琴，后来学习谱曲，和声学则是自学的。

音乐的踪迹也见于阿多诺儿时对阿莫尔巴赫的回忆。这是

个位于法兰克福附近的美丽小城市，坐落于东面的奥登瓦尔德山区是人们的度假胜地。阿多诺后来怀着极大的好感所描绘的这座城市的面貌，也是日耳曼神话传说中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化在一个孩子的想象中似乎感觉到的满足。“沃尔克曼：一座山，它的名字是幅画，是个残剩下来的亲切巨人。”这篇小作文以这种赞美的话作为开头，这是阿多诺最早的童年画面，他在很久以后与莫尼卡·普勒斯纳的谈话中称自己是个“山人”。有关1914年以前那旧式的、安静而又闭塞的德国，阿多诺从未怀有相似的好感。连铁匠铺也成了一个缩小了的瓦格纳-宇宙：“齐格弗里德的塑像早在太古时代就耸立在阿莫尔巴赫，按照齐滕费尔德的原始资料中的说法，他被砸死在这林木茂密的山谷深处。他就如此进入了儿童的图画世界。美因布劳下方的豪涅柱建于民族大迁徙时代，是根据匈奴命名的，至少当时人们是这样对我说的。这要比以前无名无姓的年代要好多了。”^④渡船，那个“远古时代的运载工具”也让人想起尼伯龙根中的恶人：“当哈根把神甫从这个运载工具上扔进多瑙河里时，他是唯一被尼伯龙根救起的人，没有比这一工具更简单和更实在地到达对岸。这一目的性极强的美景给人以追溯过去的力量。人们默不出声地谛听着渡船掠过水面时发出的声响，是那般的意味深长，因为它和几千年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在这个男人身上是如此早、如此无拘无束地进行着这社会化的过程，作为年过30的中年人，在回望他必须离开的国家时，写下了批判性的《试评瓦格纳》——他像玩儿似地完成了它。在阿莫尔巴赫，他结识了画家罗斯曼，“我的工匠歌手，‘在那儿歌唱的鸟儿，鸣声悦耳’就是在那些天里写成的，那是罗斯曼最喜欢的歌词，我把它比做了阿莫尔巴赫。这座小城离开法兰克福只有80公里，但却在弗兰肯境内。罗斯曼的一幅名为‘科伦福特的磨坊’的画，是幅未完成的

作品,严重受损,但它吸引着我。我母亲在我离开德国前把它送给了我。它陪伴我前往美国,又陪我回来。在阿莫尔巴赫我又与罗斯曼的儿子相遇了。”^⑩还在美国流亡期间,美因弗兰肯地区的景色,就常常是阿多诺魂牵梦绕的画面。不仅仅是瓦格纳,现代派诗歌似乎也在阿多诺的双亲家中颇受欢迎——这个家庭的书卷气,肯定要比人们讥讽地称之为“知识市民的”家庭要浓厚得多。佐马·莫根施特恩,一位爱开玩笑,有时并不总是那么牢靠的观察家,他称听到过阿多诺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姨母阿嘉特对波德莱尔了如指掌,还在我是个小男孩时就和我讲起了他。”^⑪后来当阿多诺研究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时,他从来不会忘记回忆起在学校之外所学到的知识:他是这样认为的,谁在小伙子时一下子爱上了一位女高音歌唱家,他才能理解这个歌剧。如果有谁要从心底里觉得《蝙蝠》好听,那么就像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所写的那样,“他必须知道什么是蝙蝠:母亲肯定给他讲过,这不是指那会飞的动物,而是化装舞会的服装;他必须能想起来,曾有人讲给他听过:第二天他才可以去听《蝙蝠》这部歌剧。”^⑫

阿多诺是在他母亲和他的姨妈信奉的天主教环境里长大的。正像赖因哈德·帕布斯特证实的那样,他可以到陶努斯山里去寻找圣诞树,他去参加庆祝基督圣体节的游行,为“亲爱的耶稣”撒玫瑰花瓣。人们不该笑话这些:传授给他的丰富的文化知识也在这里表露无遗。是的,更多的还有:只有当单纯的知识内涵与真理挂上钩,而它的核心是用宗教来表达,那样才可以真正使用“文化”这个词。由于天主教的教育给了他高品位的生活氛围,正是这氛围的扩大,才让他成为了今天留在人们记忆中的那个阿多诺。

战争,新世纪开头的那场灾难降临到这位市民出身的年轻

人身上。但对1914年8月到1918年11月那段时间，阿多诺却没有许多记述，人们找到的只是字里行间的只言片语。在一篇有关安东·韦伯恩的随笔里，讲的是极轻的弹奏是否具有美感的一次讨论，人们在这篇随笔里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处描述：“这类极轻声的弹奏”，“就像发出的声响那样，人们不应接受，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灵魂最细微躁动作出的反应，事实上它确是如此。恰恰在韦伯恩的交响乐作品中常常是这样，但在这此后的提琴和钢琴7号作品以及大提琴和钢琴11号作品的个别转换中，这是三倍的极轻声弹奏，是最轻声的歌唱，是相隔无限遥远但又无比巨大的隆隆声响；那是1916年，法兰克福旁的一条林中大道上，就是这样响着来自凡尔登的隆隆炮火声，它的响声竟传到了这里。”^⑬

此时阿多诺与他的老师赖因霍尔德·齐克尔的关系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他从10岁开始就上他的课，而且对他有着私人间的好感——尽管像他在回顾往事时所写的那样，“某些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对齐克尔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⑭尤其是在1920年前后，称赞自己的学生是个很好的讨论伙伴的齐克尔对阿多诺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这位来自一阴暗的、或许也是稍许有些中了邪的抗罗宗的老师对阿多诺来说，意味着与诗歌创作的第一次接触：“他以他的正直——对他来说使用‘英勇的’一词也并不为过，只是其色彩显得不够恰当——一生都献给了诗人这一思想。”^⑮在战争中齐克尔多次身负重伤。阿多诺写道：“去野战医院探望他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脸色苍白，因与死神打交道而呈现出那种忘掉了自我的漠然。”^⑯齐克尔属于那种带着坚定信念从战争中归来的那类人，认为旧的市民秩序已不起作用，他是第一个让阿多诺直面人生的人，让他面对新现实所具有的无情、非浪漫特征：“他推翻了文化自由这个前提的不言而喻性，



1918年前后,阿多诺、他母亲和姨妈在阿莫尔巴赫波斯特旅馆的园中凉亭前。

而我是在这种前提下长大的。在使我难忘的一次谈话中我说了宽容，而他第一次让我意识到自由放任态度所存在着的客观真理。简直使我丧失了通常总能迅速回应的语言表达能力。”^{①7} 1921年前后，阿多诺给老师献上了他的弦乐三重奏。他感谢齐克尔，后者是第一个审阅他的作品并撰文批判他的人。阿多诺后来在卡尔·克劳斯处再次看到了这篇文章。“在一篇关于我们对抒情诗有什么期待为题目的论文中，我使用了‘完完全全’一词，他以无可怀疑的爱，用手指着这言之无物同时又欠妥的表达形式。”他也是第一个鼓励阿多诺写诗的人：“我给他看的一首诗写的是月亮：‘颤动的嘴角懒懒地迸出一支歌/从楼梯在咯咯笑着的房屋上方飞过’。一位文学方面的行家认为，‘咯咯笑的楼梯’用词不妥：他想起来应该是侍女的笑声。齐克尔说：‘那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吧。’他的庇护使我豁然开朗，原来艺术品的美是与缺欠毫无关联的，而描绘的物体必须要有美感。”^{①8} 月亮、颤动和咯咯的笑声——这些都是表现主义抒情诗中常用的措辞，例如阿尔弗雷德·利希滕施泰因的诗歌。它们让大都市处于夜色之中，蒙上一层陌生感，在这朦胧夜间，新的运动形式在不断地生成。

1918年11月，输掉战争显然已成定局。在基尔，发生了水兵哗变，他们对仍命令他们出击的海军将领深表不满。成立的工人士兵委员会很快在整个德国蔓延开来。这一运动的结果，导致了菲利普·沙伊德曼宣布成立共和国和威廉二世的退位，他流亡到荷兰去了。社会民主党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领导下，谋求走议会民主的道路。但这并不是毫无争议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德国也产生了影响。后来成为德国共产党内左翼激进的斯巴达克同盟，他们并不想要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

要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1919年1月，斯巴达克同盟在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但被血腥镇压了下去。社会民主党的国防部长诺斯克尽管能用他那毫不手软的政策阻止在德国建立共产党的政权，但他所依赖的部队——主要是志愿军——很快成为游离于共和国之外的一股势力。年轻的民主党担着《凡尔赛和约》的重负，它宣布德国是唯一对战争负有责任的国家，它不仅让德国割让土地，而且也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左翼和右翼力量发起的暴动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共产党人在汉堡和希特勒在慕尼黑想用武力夺取政权的1923年为止。法国人占领鲁尔区，给了民族主义以新的口实。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果与一个人的关键时刻叠合，那么印象会尤其深刻。当共产主义的预言席卷德国时，阿多诺刚满15岁，正处于要自立的开端。对革命的记忆陪伴了他的一生，尽管他在后来提及它时措辞是那么的小心翼翼。对阿多诺来说，斯巴达克同盟的失败是政治上的原始伤痛。在后来“关于历史和自由的学说”的讲座中，他谈到了“自由的可能性”，它是在非自由中成长起来的。这是个返回到历史的理想共产主义运动，它在他的面前浮来晃去，它囊括了古罗马时期斯巴达克斯的奴隶暴动、德国的农民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期间激进的革命党人巴贝夫的暴动计划。“很难说，在历史那无边际又难以窥见其全貌的结构中，不会真的发生些什么其他的事情，人类真的能从污物中挣扎出来。我本人相信，在我年轻时，曾经历过这些事情差不多会发生的瞬间。”^{①9}人们可以想象两条截然不同的哲学道路，一条是强调理性的相互关联，边归纳边思考；另一条是将迄今为止未加考虑的东西、激动人心的场面置于中心位置。第一种哲学把宇宙和秩序作为对象；第二种是把事件和历史作为对象。一种是倾向于存在学说，倾向于实体